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罗荣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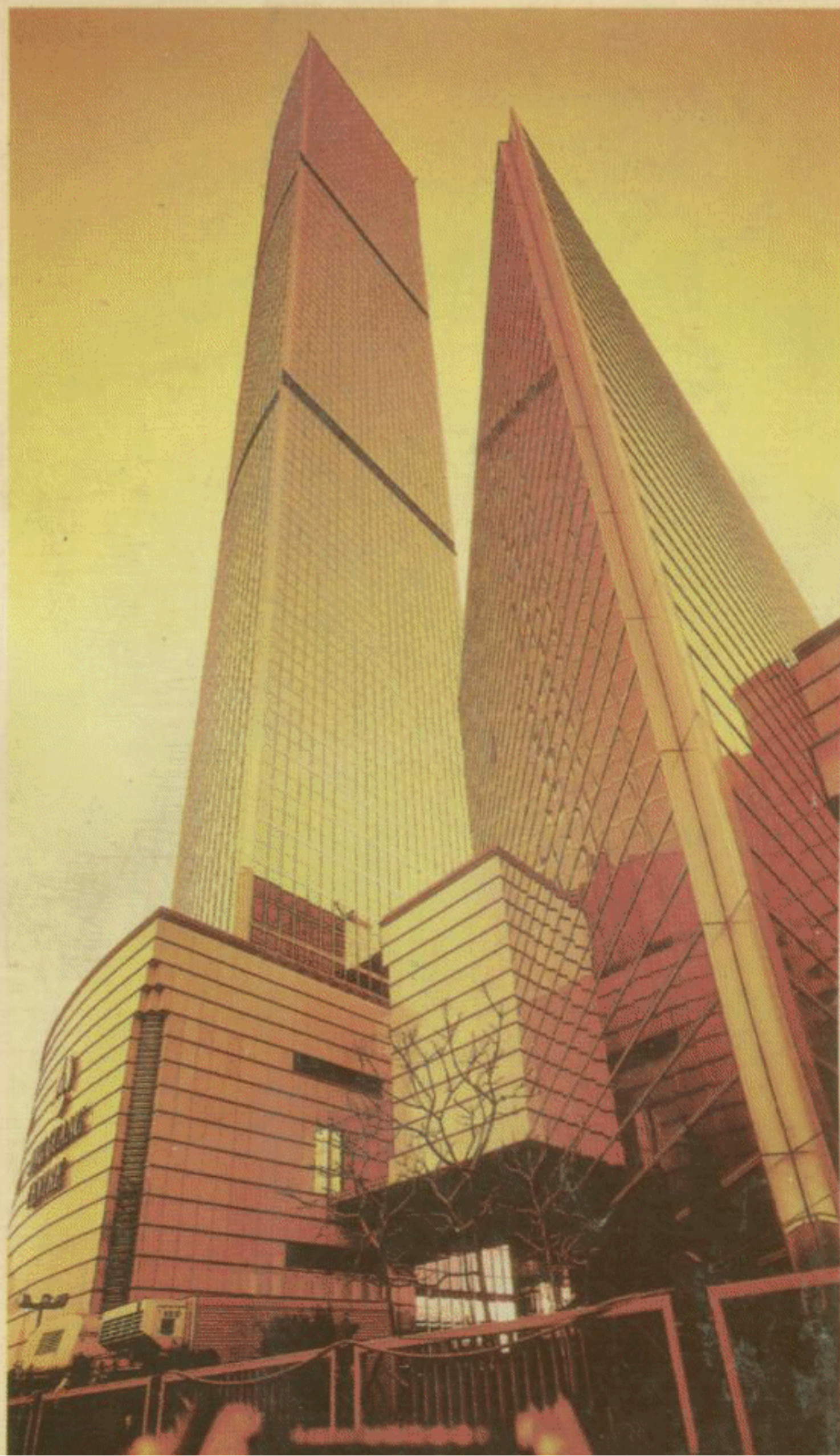
现代化

新论续

篇

东亚与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 现代化新论续篇

——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罗荣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附 录

《现代化新论》序·····	(263)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编者的话·····	(270)
《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前言·····	(275)
《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序·····	(280)
《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序·····	(283)
《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序·····	(285)
开拓世界史的新视野——《全球分裂》中译本序·····	(290)
开拓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	
——评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	(306)
《通向现代世界的五百年》序·····	(313)
编后记·····	林被甸 董正华 (321)

## 引言：大转变时代需要新的发展观

### 发展思想的演变

在二十世纪很快就要降下帷幕之际，人们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问道：什么是跨世纪的全球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发展。

发展 (development)，或译开发，是战后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在半个世纪以前还很少使用这个词，而今天这个词却天天出现在报刊和电视上，报道举世瞩目的发展大潮席卷全球的动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定位在全球发展的坐标轴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ies)，西方国家与日本则被称为发达国家 (developed countries)。这说明世界格局变化之大：过去人们习用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富裕”与“贫困”之分，而今莫不用“发达”（发展）与“欠发达”（欠发展）的区分以代之。

谈到发展，人们都把它看成一个经济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发展是众多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交织作用的动力学。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过去四十年中，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发展思想的起源和演变，反映了人们对当代世界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它的最早起源是经济的与政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解决战后世界面临的严重的危机，通过美援的方式提

出了各种区域性重建与援助计划，以推动一些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走出困境。六十年代初，联合国承担了对经济落后国家（也就是低收入国）的巨大经援工作。从此发展问题一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在六十至七十年代，联合国主持了两个“发展十年”（decade of development）的具体工作，它使多数低收入国的经济增长取得明显进步。<sup>①</sup>在战后最初阶段，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而言。但二十年增长的实际并不如预想那样卓有成效。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于1960—1985年开发协作25周年报告中所指出：“开发援助的一个最为令人头痛的缺陷是它在减轻赤贫方面的贡献十分有限，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农村地区尤为如此。”<sup>②</sup>从七十年代以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各种批评。国际学术界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尺度与目标等一系列新问题，要求对“发展”概念的重新界定并探索新的发展思路。<sup>③</sup>

建立在西方经济增长模式上的发展理论在现实面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

1. “增长第一”的战略与GNP增长模式使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蔓延。单纯追求人均GNP和人均GDP的增长，往往导致忽视其他发展指标，如消除贫穷，公平分配，满足基本需要，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改善人的素质，等等。经济发展与精神发展相背离的倾向引出了一系列现代发展危机。

2. 发展中国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而推行“大突击”战略，其经济增长率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也带来了国民

---

① Lester Pearson,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70.

② 《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27页。

③ 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经济严重失调、债务危机、社会失序、城乡差距拉大等新问题。不同国家的国情与面临的特殊问题被忽视，西方发展模式被误认为是唯一的经济增长模式。

3. 就世界范围而言，市场经济引导的全球性“增长热”，现代高科技引导的高速工业化，带来不可再生性能源与资源的大耗费，世界人口的高增长，生态环境的大破坏。未来学家发出警告：如果全球 58 亿人口按美国方式占有和挥霍财富，地球“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流尽最后一滴血”。于是引起了关于“增长的极限”的争论<sup>①</sup>。

近二十年来，发展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首先是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加以区分：前者意味着更多的产出，而后者则应包括产出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改变。尽管国际社会科学界对发展的目标、战略与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也逐渐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共识：

1. 不应该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经济范畴，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和人文范畴。

2. 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指标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有效的的手段，但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面的目标，更不是终极目的。

3.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步伐，各国的独立发展已日益形成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因此，不但应关注国家内的发展协调，同时要关注全球的发展协调。

这样，经济发展就进一步扩大为包括社会发展的新概念。过去的西方社会学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社会进化论基础之上，只有“社会变迁”的概念。它把社会系统的进化、退化、停滞等各种现象都纳入社会变迁的范畴。在战后初年，“社会发展”的概念只是

---

<sup>①</sup> 《增长的极限》，梅多斯等著，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P. Streeten, What We Learned? *The Relevance of Economic theories*, ed. by Jezef pajestka, 1980.）

作为消除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社会障碍的前提条件而提出的。随着认识的提高,经济发展规划中增加了涉及居民的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联合国对发展问题的重视也不断提高,而涉及的面也逐步扩大。1977年联合国正式通过了关于发展权的概念。1984年联合国设立环境与发展的世界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1987年通过了《东京宣言》,提出了推动经济增长,改变增长的质量,以持续性、平等、社会公正、安全作为社会指标,等等。<sup>①</sup>这一切都说明:发展问题日益取代和平问题而上升为全球性的紧迫问题。

应该说,发展一词至今缺乏明确的时空限度,带有相当的概念模糊性。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框架来看现代发展,应该把它理解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过渡。这样,发展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范畴就较易加以明确的科学界定。尽管这一大过渡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加快向现代社会的有序的转变;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探索现代社会的自身完善与持续发展。

正如1980年在荷兰召开的“争取另一种发展的国际基金会”(IFDA)的报告所指出:“发展是人民与社会解放的进程;不能把发展降低为经济增长”<sup>②</sup>。在这个意义上,全面的社会发展实际上应理解为现代经济发展引起和同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性的各种社会变革,其中首要的是适应现代生产力高度的社会结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

<sup>①</sup> Tokyo Declaration, *The Western Pacific* (Alan Burnett), 1992.

<sup>②</sup> Building Blocks for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evelopment Dialogue*, Sweden, 1980: 1.

##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紧密相关的关系，一般地说是相当明确的。

现代经济增长是现代文明的推动器。十八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研究了“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积累。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探讨了现代大生产对现代社会的革命改造作用。本世纪中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可以量化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运用计量的方法，由蒸汽机带动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社会变革，已可进行量化的分析。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一般都低于0.1%，即大约要700年才可能使物质财富增长1倍。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00年间，年均增长率一下猛增至1%或更高，这样大约只要70年社会财富即可增长1倍。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欧洲和北美在1850—1950年间的人均收入在一个世纪中增长了7倍。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格局也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西方超越并压倒了东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北美出现20年经济繁荣，进一步把这一地区带入了大众高额消费的福利社会。这样，发达世界与欠发达世界之间发展差距就进一步扩大了，从而出现了南北关系问题。发展中国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明显差距，要消除贫困，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必须把发展现代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率放在头等重要地位。

现代经济增长不断对现代社会的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它的一个突出社会特征是使经济权力摆脱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约束而凌驾于其上，愈是富裕与发达社会，经济增长的因素愈重要，愈是独立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进步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中轴线进行的。我把这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

中轴原理”<sup>①</sup>。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坐标轴上，经济发展的曲线愈是偏向生产力轴，则社会财富的增长愈快，社会进步的幅度愈大；反之则较慢，较小。

不论哪种社会制度，没有高经济增长为依托，所谓的社会优越性都将流于空谈。中国在这方面有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既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实现工业化，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走过弯路，错过了一些重大发展机遇，在一个时期用空洞的政治口号压倒经济发展。邓小平拨正了航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sup>②</sup>由于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进行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转换和体制改革，从1979年到199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3%，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5%。

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发展之间不是单向的作用关系，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六十年代，西方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认为：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与自主这些目标之间具有整体性、连贯性与相容性，发展一般说来是和谐的与直线式的。但七十年代以来，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却认为这些目标之间常常是不相容的，而是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往往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也称为依附性发展，或负债增长，并带来贫富鸿沟拉大，社会失序，政治腐败。与西方理论家的设想相违，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威权主义政权 (authoritarian regime) 取得很高或较高的经

---

<sup>①</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8—99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第225页。

济增长率，而仿效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往往变得像有名无实的奢侈品。此外，对经济福利与社会福利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相关联系，人均增长是否一定会导致人类幸福的同步增进，也引起学者们进行实证性的深入探讨。<sup>①</sup>显然，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裕，精神上十分空虚，是否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丰裕而幸福的社会，这确是发人深思的问题。<sup>②</sup>

必须看到，由于国际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各种条件之不同，经济增长与其他各种发展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各不相同，形成不同的互动关系。例如，被西方古典经济学奉为神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鼓吹一种线性的自发的和谐发展论，这对于经历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培育成熟的某些西方国家或许有一定的可行性。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在大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与国际环境中起步的，没有形成健全的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听任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行事，而只能利用现成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家权力来引导和推动经济的发展，掌握资源分配，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培育市场，改造国家权力。就是在西方国家，本世纪以来的总趋势也是：政府的间接与直接的干预都在加强而不是削弱。在这里，增长度、福利度、自由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现实情况迫使世界银行的专家提出要“重新考虑国家的作用”。他们认为，根据过去四十年的经验，为了争取成功的发展，“政府支持的而不是取代竞争性市场的战略为迎接发展的挑战带来了最光明的希望”。<sup>③</sup>

在世界经济发生巨变的新形势下，还有许多新东西要学习，有

---

① Richard A. Easter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d. by Paul A. David.

② Fred Hirs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1977.

③ 《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9—11页。

许多问题要重新探索。

## 需要建立新的发展哲学与新的发展战略

四十年前形成的西方发展理论已不适应新的世界形势，需要从新的高度来研究发展问题。仅仅研究发展经济学与发展社会学已不够用，为了赋予发展以新的人文价值内涵，还应建立新的综合发展哲学。完整的发展概念，不应仅限于经济学的含义：产出更多些，更快些；还应包含生物学的含义：健康地成长，良好地发育。这要求在思维与行为上都进行一次自觉革命。

现代发展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忘记从历史文化中吸取优秀遗产。两千年前，中国哲人孔子就提出了富有启示的发展观。据《论语》记载，他曾去到人丁兴旺的卫国。弟子问道：“人丁兴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孔子道：“让人民富起来。”弟子又问：“富起来了，下一步又怎么办？”孔子道：“教育他们。”<sup>①</sup>在孔子的思想里，人丁兴旺，使民富裕，施民教化，形成了明确有序的国家发展思路。另一位哲学家老子说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sup>②</sup>这些话，在今天读起来，都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中，将是东西文化的大融合。以追求增长与现代科技的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应从追求和谐与协调的实践理性为特征的东方文明中获得滋养。

新的社会发展战略，应该是自主的优化选择的战略。它不可能走早期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即听任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去自发

---

<sup>①</sup>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sup>②</sup> 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

地推动社会演变；也不可能找到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捷径，即按主观意志对经济规律发号施令；它只能探索一种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而又自觉地探求的发展导向。这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对它的正确引导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在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向选择中，应特别注意两种发展病毒（或称发展综合症）的感染。一种是过度发展（overdevelopment）病毒：症状为无限制的物欲追求，资源、能源的无节制的浪费，商品拜物教与单纯科技主义风靡，等等。这种趋向主要在发达世界蔓延。另一种是超前增长热（hyper-growth）的病毒：症状为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追求高速度，浮夸性高攀比，模仿西方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等等。这种趋向主要出现在欠发达世界。对这两种不良发展趋向如不警惕，都将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前程。

关心人类命运的各国有识之士都日益认识到重新构筑发展理论的迫切性，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构想。归纳言之，大体上有以下一些基本思想：

1. 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基本内涵，对世界各民族都是相同的；但由于发展起点之不同，人文与历史条件之不同，各民族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应适合自己的国情。发展是多模式的，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理论。必须正确处理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即民族特性的关系。

2. 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导思想。“发展权利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每个人及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

3. 提高个人的、民族的、社会的内在发展活力，加强发展的自主性，减少外在依存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导向。国际发展指标是必要的参照系，但如果脱离本国实际去盲目追踪先进国家的发展指标，是根本不现实的，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4. 维护生产力尺度与生态尺度的统一，是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人与被征服的自然建立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生态循环，才可能有利于人类社会持久而稳定的发展。

5.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正在造成国际社会系统的新矛盾。现行的竞争型的增长最终将围绕发展争端引起世界经济大战。只有建立相互协调型的增长，才能迎来下世纪的共同发展。尽管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进入大同世界的必经阶段，但只有破除发展拜物教（development fetish）的偶像并超越发展主义，建立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才可能使人类逐步接近大同的世界。

展望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它将达到增长的极限呢，还是更高的增长？的确令人有些迷惑。上个世纪有位法国化学家曾预言，人类在一百年内将揭开原子的秘密，但到那时上帝老人将会带着一大串钥匙下凡人间，说道：“先生们，闭幕的时候到了。”我不相信巧夺天工的人类会遭受如此可怕的天谴。我宁愿相信著名的发展论学者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他富有挑战性的杰作《亚洲的戏剧》中的预言：

在生活中，当戏剧还正在展开时，演员们的愿望被假定为在限制条件内自由地选择不同的表演进程。这样，历史就不是事先就决定了的。相反，它处在人类影响的力量范围之内，因此，这样表演的戏剧不见得就是悲剧。<sup>①</sup>

---

<sup>①</sup>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4页。